

發展的迷思

ILLUSIONS OF DEVELOPMENT

許寶強 汪暉選編

發展，是指路明燈還是幻象？

原初豐裕社會

權力與能見性

發展與知識的政治

印度西部農村技術與價值的再生產

農民、種籽商和科學家

後現代主義、性別、發展

女性主義東方論述與發展

文化/社會研究譯叢

發展的迷思

許寶強 汪暉 選編

編委成員

汪 暉 宋偉傑 袁 偉 許兆麟 河 渠
許寶強 陳順馨 劉健芝 戴錦華 羅永生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in

Oxford New York

Athens Auckland Bangkok Bogotá Buenos Aires Calcutta
Cape Town Chennai Dar es Salaam Delhi Florence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Kuala Lumpur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Mumbai
Nairobi Paris São Paulo Singapore Taipei Tokyo Toronto Warsaw

with associated companies in Berlin Ibadan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文化／社會研究譯叢」編委會 1999

First published 1999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3 5 7 9 10 8 6 4 2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t the address below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book in any other binding or cover
and you must impose the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發展的迷思
文化／社會研究譯叢（四）

許寶強 汪暉選編

ISBN 0-19-587844-2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前言：發展、知識、權力

◆ 許寶強

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是一種意識形態，一種認為經濟增長是社會進步的先決條件的信念。以經濟增長作為主要目標，依據不同的手段，例如高科技、工業化、國家干預或市場機制，產生出不同版本的發展主義學說——自由市場、出口導向、依附發展（dependent development）或以發展為主導的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等等。

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各類發展主義學說都沒有（或沒有能力）反思一系列類似華勒斯坦（I. Wallerstein 本書第一章）所提出的基本問題：發展是甚麼？究竟為誰或為甚麼要發展？甚麼在發展？經濟增長是否就等於改善人們的福利、提高人們的生活質素？經濟增長過程中，不同社羣所付出的代價又是什麼？對弱勢羣體（如原住民和女性）的影響又如何？除了「現代化」和「工業化」以外，有沒有另類的發展（或「不發展」）軌道，能更直接改善人們的生活？謀求發展有甚麼政治含義？這些都是發展主義忽略了的重要課題。收編於本文集的文章所要探討的，也正是這些課題。

對發展主義的批判並不是新鮮的事物。質疑「現代化」或「工業化」就代表了人類的進步，古已有之，其中最受注意的聲音，恐怕是馬克思主義。然而，儘管馬克思主義提出剝削和勞動異化等批判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重要概念，並據此要求平等和解放人類的社會主義，它並沒有否定「工業化」或「經濟增長」本身是社會進步的必要前提。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基礎、興起於60年代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論（dependency theory），雖然大力抨擊發達地區（或中心地區）

對欠發達地區（邊陲地區）的剝削，使後者不能發展，但在根本上它並沒有否定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相反，不論是提出脫鉤（de-linking）或依附發展，依附理論學派在關注資本主義發展造成的不平等的同時，並沒有質疑如何使欠發展地區（邊陲地區）成功地增長經濟財富這類議題（參閱Amin 1990, Evans 1979, Cardoso and Faletto 1979）。

依附理論於80年代日漸式微，其中一個原因恐怕與所謂東亞四小龍的經濟「奇跡」有關。儘管東亞四小龍均在頗大程度依附美國的市場和日本的技術，但它們在80年代的經濟增長卻差不多是全球最快的。為了解釋這一個現象，而又不願掉進自由經濟學的窠臼，西方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提出了所謂「以發展為主導的國家」的概念，認為東亞經濟的高速增長，是政府有效干預的結果，而非自由市場的功績（Amsden 1989, Wade 1990）。然而，這種對自由市場發展學說的批評，基本上仍是把經濟增長等同發展，並以追求有效的增長方法為最核心的關注點，因此可以說還是陷於發展主義的範式之中。

經濟增長的迷思

發展主義其中一個重要信念，是認為經濟增長比不增長好，快速增長又比緩慢增長好。這種將「發展」等同「經濟增長」，再將「經濟增長」等同美好生活的信念，本是特定的歷史產物（見華勒斯坦文章），但卻被看作為普世通行的真理，支撐着整套發展主義論述，將豐富多元的人類需求和自然生態，約化成單一的面向，僅以經濟指標來衡量。

用來量度經濟增長的，主要是國民生產總值（GNP）或本地生產總值（GDP）等指標。嚴格來說，這些經濟指標均以貨幣作為量度單位，因此反映的只是一個被界定的經濟體內年度的貨幣流動總額。不過，這些指標卻經常被看作能同時反映「福利」、「生活素質」和「進步」的程度，導致不少政府甚至會用國民生產總值或人均總值增長作為發展計劃的主要目標。這種理解，構成了偏好「經濟增長」的

發展主義論述的重要基礎。

然而，國民生產總值等指標究竟涵蓋甚麼？反映了哪些經濟面向？又掩藏了哪些生計踐行？它能反映「福利」和「生活質素」嗎？

這些指標是根據某年度內生產出來的貨品和勞務以貨幣衡量的價值，要靠通過貿易流程，才可以被匯總算入國民生產總值之內。因此，那些沒有納入貨幣流通過程，從而未能被貨幣衡量價值的產出及勞務，例如主要由女性負責的家務和育嬰工作，或是自給自足的農業勞動，又或是朋友、親屬之間的互惠活動，或是志願組織的服務等，均沒有被計算在國民生產總值等指標之內，因此家庭婦女、農民和志願工作者等對國民經濟的貢獻往往被低估了。

一個與此相關的有趣現象是，西歐十八、十九世紀工業化的過程當中，大量婦女由農村或家庭移出，投入勞工市場；一部分跑進了工廠，但更多的婦女則投身服務行業。以十九世紀中期的英國為例，約四成投入勞工市場的婦女從事女傭工作（Tilly and Scott 1989:68-69）。換句話說，婦女由從事沒有工資的家務勞動，轉到收取工資的女傭崗位，提供的雖然也是家務勞動，然而這轉換卻奇跡地使國民生產總值有所增加。

十九世紀的英國並不是唯一的例外，戰後美、加、澳、英等地，隨着世界經濟急促膨脹，大量婦女投身勞工市場。女性加入市場工作的比率由1950年的25-40%上升至1990年的60-68%，當中已婚婦女投進勞動市場的比率則由1950年的10-20%上升至1990年的45-60%（Snooks 1994a:15）。

國民生產總值在統計了婦女加入勞工市場之後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之餘，並沒有扣除她們因而得減少在家庭或農村的非工資勞務時間，因此高估了婦女就業所帶來的好處。事實上，婦女的非工資勞務對社羣的貢獻非同小可，據史諾斯（Snooks 1994a:17）估算，澳洲在1860-1990年的家庭非工資勞務佔澳洲總體社羣收入（市場工資總額加家庭非工資勞務）的35.8%，而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更估算非

工資勞務所生產的「價值」高達國民生產總值的一半（James 1994: 173）。

這引起了另一嚴重的問題，就是在計算國民經濟增長時，由於工業化和市場化引致非貨幣經濟向貨幣經濟轉移，結果是原來在非貨幣經濟中沒有被算入國民生產總值的產出或勞務，在經濟貨幣化後卻被算入指標之內，從而高估了工業化或市場化所帶來的經濟增長，這種在統計上對工業化和市場化的偏好，不單對歐洲「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增長」造成錯覺（見下文），在當代第三世界國家（包括中國）的工業化或市場化的過程中，由於仍然採用國民生產總值來衡量發展程度，結果亦是高估了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素的「增長」。

此外，國民生產總值或人均總值是以總數或平均數算出，因此它不能準確反映不同地區或相同地區內不同人口之間的不同「福利」。例如目前一些世界性組織在比較不同地區和國家的經濟狀況時，只能將不同國家的貨幣折算為一種通用貨幣（通常是美元）才可進行比較，但在折算過程中所採用的匯價，卻往往會造成對某些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高估」或「低估」的現象。有人曾計算，1960年至84年間，發達國家與低收入國家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差距擴大，有三分之二是由匯率的實質變動所造成的（Wood 1991）。換句話說，實質匯率的變動往往能在很大程度改變不同地區和國家之間以貨幣量度的收入分配狀況。此外，在一些收入分配極不平等的地區或國家之內，倘若國民生產總值或人均總值的增長與兩極分化同時出現，那麼對大部分貧困人民生活素質的改善便很可能沒有多大意義¹。

除了上述的問題以外，採用國民生產總值等指標作為計劃目標，亦會鼓勵較貴重但卻不一定是必需的產品的製造。相反，由於技術進步而引致產品價格下跌，卻會使國民生產總值減少。因為較貴重的產品只有富人才有能力消費，而產品價格下跌卻對窮人有益，因此這些指標明顯帶着不平等的偏見。

國民生產總值等指標只量度當年產出的流量（flows），但對擁有

固存財富（stocks）——包括人工的和自然的——所帶來的福利排除在計算以外。舉例來說，若我們今年購入一部新的電視機，但同時把舊的拋掉，結果是新購的電視機的價值被加入國民生產總值內，但被拋掉的舊電視機的價值卻沒有在計算中扣除，結果是高估了人民物質福利的提高。

更清楚的例子是對自然財富（例如空氣、食水、森林等）的計算，在把森林的樹木製成傢俬的過程中，傢俬的產出是算進國民生產總值內的，但生產過程中對森林的破壞（大量伐樹）、對食水的污染（如製作傢俬的油漆等化學品被排放在河流中）和對空氣的污染（減少林木將減少對大氣中二氧化碳的吸收），卻沒有在總值中扣除。更奇怪的是，由於自然環境的破壞，人們不能再免費地享用清新空氣和飲用清潔食水，只好到超級市場購買「蒸溜水」或購買飛機票到夏威夷享受清新空氣，結果進一步增加了國民生產總值；又或是為了把被污染了的自然環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過來，只有購買昂貴的設備以清除環境污染，這亦會增加國民生產總值的數值。換句話說，破壞自然的過程為國民生產總值提供了兩次增值的機會。

同樣的邏輯亦可應用在人類環境的計算之上。工人在工作過程中（特別是在惡劣的工作環境中工作）亦會像機器般「耗損」（depreciate）——視力衰退、消化系統破壞、思想退化等，但這和自然環境的破壞一樣，也不會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扣除。不過，為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這些「耗損」而興建的醫院和增聘的醫療人員，則被算進國民生產總值之中，結果人類健康的破壞也為國民生產總值提供了兩次增值的機會（參閱Anderson 1991:21-28）。

薩靈士（M. Sahlin 本書第二章）更進一步指出，所謂資產是財富，愈多便愈好，這種觀點只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並不適用於原初社會的採獵部族。當採獵地附近的動植物資源差不多耗盡時，採獵戶必須遷移。換句話說，游牧是採獵經濟不可或缺的部分，只有不斷流動，才能維生。然而高流動性卻與積累資產不能並立。對終日

遷移的採獵部族來說，資產只會變成負累。一方面，採獵部族面對的物質壓力相對地輕，他們需要的生活資料，大部分能在居住的山林草野之中隨手獲得，當食物（野獸）或食水資源漸竭時，只要轉移往另一處地方，問題便能解決。

因此，對採獵者來說，並沒有必要建立庫存，積穀防饑；另一方面，不斷遷移使攜帶資產成為吃力不討好的苦差，輕裝上陣才能令採獵戶的轉移流動舒適方便。為了使移徙過程順利，部分採獵戶更會刻意毀壞其所「擁有」的大型「資產」，甚至把不能移動的老弱傷病「人道毀滅」。對採獵部族來說，人生的終極目標，絕非不斷積累物質資財，而是得到不用背負沉重包袱的流動自由。

然而，原初社會的採獵民族的物質生活是否便十分匱乏，處於絕對貧困的水深火熱之中？若從人的慾望無限，但卻受有限資源制約的現代經濟學邏輯出發，答案才會是「對」的。不過，「慾望（特別是對物質的需求）無限」只是一種現代社會的建構，並非自有永有的規律，因此慾望的滿足絕不必要透過不斷擁有物質財富來實現；減少對物質資財的慾求，往往能使慾望容易滿足，而後者正是原初採獵社會的經濟邏輯。循這思路，我們甚至可以說，資產不斷積累的社會才是製造貧窮的源頭：若貧窮的意思是物質資財的擁有並不能滿足個人的慾望，那麼強調（甚至鼓勵）慾望無限的現代社會，是沒法不無時無刻製造貧窮。相反，原初社會的部族民雖然沒有甚麼固定的物質資產，但他們並不貧窮，因為在他們特殊的社會脈絡（採獵經濟）下產生的對物質的慾求，對他們來說是十分容易獲得滿足的。在一個不以積累資產多寡來定斷社會地位的原初社羣，「貧窮」自有不同的意義。換句話說，以無窮慾望和物質資財匱乏來衡量的「貧窮」，只是現代文明的產物。

國民生產總值等指標只是從數量上計算福利，但「質」的改變，例如寧靜愉快的心境，卻在很大程度上沒得到反映。國民生產總值這些指標沒有把工作能否為人們提供愉快的感覺考慮在內，因此假若人

們因為一些較苦悶的工作職位有較高薪酬而轉工，雖然國民生產總值因而會提高，但人們的生活質素卻未必會改善。

一個有趣的例子是這些指標對餘閒（leisure）的處理。當我們能夠以較少的工作時間來生產出與以往同樣多的產品或勞務時（這可能是由於技術進步所致），國民生產總值並不能反映多出了的餘閒時間所帶來的好處；但假若我們把多出來的餘閒時間用來生產更多的產品或勞務時，卻會引致國民生產總值的增加，從而好像「提高」了「福利」，反映了這種統計方法對餘閒的歧視（Anderson 1991:29）。事實上，正如薩靈士指出，原初社會雖然沒有現代工商業社會的物質消費品，但活在原初社會的人卻不用像在工商業社會一樣要長時間工作，因此餘閒時間較多，特別是一些居於擁有豐富資源的森林的採獵民族，往往一天工作三至五小時便足夠整天的食用，剩下的時間，除了休息和睡眠以外，還有很多可以用作社交和談天等現代人夢寐以求的生活，因此，採獵民的生活素質不見得比現代工商業社會的人為差。

吊詭的是，在「餘閒」備受忽視的同時，「餘閒工業」卻在當代蓬勃發展。高爾夫球場、狄士尼樂園式的大型遊樂場等等，像雨後春筍般湧現，為現代（富）人解決他們的「餘閒」問題。然而，這些能增加國民生產總值的「餘閒工業」，卻背負着十分沉重的社會和生態的代價²。

超英趕美的幻象

發展主義另一個迷思是：所謂「落後」地區若能採取有效的方法，是可以慢慢追上發達國家的。而有關「落後」地區「發展」的研究，主要是論爭甚麼才是「有效的方法」。新古典經濟學自然開出了「自由市場」、「私有化」和「出口導向」的藥方；社會主義國家則以計劃經濟作為發展的啟動器；部份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和凱恩斯主義者則倡議由「以發展為主導的國家」策略性地扶助「重點」工業。然

而不論是那一個派別，多數都不反對「工業化」是經濟發展的必要（甚至是充份）的條件。

將工業化（或所謂生產性產業、科技產業）置於經濟增長以至發展的中心位置，是各類發展主義論述的通病，這種生產/工業/科技中心論，基本上忘記了經濟活動其實是包括了生產、交換、流通、分配和消費（或使用）等環節，而這些環節都不僅僅是純「經濟」的活動，當中包含了各類文化、社會和政治因素。脫離了交換、流通、分配和消費等文化社羣活動和政治踐行，純生產或科技本身是沒法促進經濟發展的，或更確切地說，從來就沒有純生產或純科技的活動。

60年代到90年代中的東亞高速增長，為這種產業/科技中心論提供了新的養份，並成為了頗具影響力的「以發展為主導的國家」學說的「實證」依據，為新一輪的發展主義信念打上補針。不過，過去十多年東亞地區較快的經濟增長，其實並非是由於政府以干預金融市場來集中龐大的資金對工業作高強度投資，以達至所謂「持續創新效應和產業結構高級化」而導致的，而更多是與當地的大企業和政府壟斷或操控了生產、交換、流通、分配和消費等環節有關。以日本的對外投資為例，1981年至94年間，投資於工業的總值約是一千一百五十多億美元，而投放在服務、金融、保險和商業的總值，則達一千七百六十多億美元，若加上運輸、地產、農業和礦業等非工業部門，非工業的對外投資總值差不多是工業投資的三倍；而這些地區近日陷入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也並非所謂「品質圈」和「看板管理」等技術受到限制，更主要是由於這種壟斷結構造成日益嚴重的貧富不均，削弱了大部份人口的消費能力³，從而導致消費不足所引起的生產「過剩」危機。

以備受談論的日本經濟為例，強調工業和生產領域的論述，只把討論的焦點放在高科技之上，完全漠視日本的大企業集團（特別是其中的商社）在戰後長時期獲利和高速擴張，很大程度上是依賴它們所建立的廣泛貿易網絡和與政權的良好關係，從而得以壟斷或部份壟斷

交換、流通和消費等市場環節，包括貨運、保險、金融服務、資訊、廣告、百貨連鎖店等。掌握了這些交易和政治網絡，日本大企業能夠控制工業產品和各類勞務的供求渠道。

日本的商社是推動日本經濟發展的重要企業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商社在八十年代初直接的或與其他企業合作的對外投資中，超過一半是以少數所有權（minority ownership）的形式出現。換句話說，日本商社在外國的合資企業中，通常佔有不超過50%的股權（大部分更是低於30%），而外國的政府或企業才是最大的股東。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不難理解。除了受到當地政府的投資法例（特別是想保護本土工業的第三世界國家）的限制以外，日本商社本身亦主動以不擁有多數所有權的身份與外國企業合作，因為全資擁有雖或可較能保障產權，但卻同時會成為某種負擔，特別是在世界經濟不確定的情況下，「綁在產業」上便意味着資本的流動性減低，風險增大。相反，作為擁有少數產權的合資者，日本商社能夠較靈活地利用它們的投資，一方面可減少初始的投資成本，另一方面亦可降低日後營運所面對的經濟和政治風險。

再者，放棄全權擁有合資企業，並沒有導致日本商社的控制和管理權力下降；事實上，由於日本商社的經營主要以貿易為主，關心的是貨品的流動（flow）而非固定資產（stock）或實際生產，所以它們情願把資金投放在建立廣泛的貿易網絡上，特別是在重要的世界經貿金融中心（如紐約、巴黎、倫敦、香港等）建立各種「商業基建」，包括貨倉、船運、保險、金融服務、技術資訊等，以控制世界市場。只要能掌握工業產品在世界市場的供求渠道和資訊，以及生產者所需的金融和商業服務，日本商社便不難控制合資企業的生產和經營方向，並能獲得遠比生產/工業活動為高的利潤（參閱 Kojima and Ozawa 1984）。

二十世紀下半葉的日本並非特例。回顧資本主義世界的歷史，可以看到「領先者」往往在一些環節（不一定是工業）的技術或組織中

佔有優勢，因此獲得壟斷的位置。而所謂發展的競賽，就正如華勒斯坦所言，只是努力「創造或保持自己的壟斷優勢，或破壞別人壟斷優勢」。各種發展策略：十八世紀的重商主義、十九世紀的工業化、入口替代、出口導向、創新科技等等，基本上旨在利用政權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企圖削弱對手競爭能力，以確保自身的壟斷位置。

對生產領域的迷信，很可能是源於對十八、九世紀歐洲（主要是英國）的工業革命的誤解，以為工業（技術）革命確曾帶來了快速的經濟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但事實上，十八、十九世紀的英國「工業革命」對經濟增長（以人均國民收入計算）的貢獻並不十分大。史諾斯指出，與過去的經濟增長率比較，英國在「工業革命」時期的經濟增長，並不突出。根據他的估算，在1086至1170年的前工業革命時期，英國的經濟增長速度與1801-1831年「工業革命」高峯期基本上差不多，而在十六世紀上半葉的增長率，更是「工業革命」高峯期的三倍（Snooks 1994b:16）。

此外，牛津大學經濟史教授Feinstein最近重新估算英國「工業革命」時期中，工人的實質生活水平。他的研究指出，以往對「工業革命」時期工人生活水平的樂觀估算，存在不少問題。他綜合了一些新的資料後指出，在1778-82至1853-57這七十五年間，英國工人的實質工資增長少於30%，而在1830年以前的五十年間，工人的平均工資基本上沒有什麼實質增長。人口增長導致對工人依賴的人數增加，伴隨着工業化而來的城市化所導致的居住環境變壞和公共衛生惡化，再加上社會福利補貼的減少，使得工人在「工業革命」這七十五年間的實質收入增長，可能只有10-15%。換句話說，「工業革命」並沒有大幅地為大多數英國工人帶來美好的物質生活。而1810年間此起彼伏的工人抗爭運動，正好從側面反映「工業革命」對工人的負面影響（Feinstein 1998）。

不論是自由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均以十九世紀英國作為模型，而看不到更長時段（自十六世紀甚至更早）和更大範圍的資本主

義歷史，因而看不到十八、十九世紀英國的工業化，只是資本主義歷史長周期過程中，資本家在特定的歷史脈絡中把資金投放到工業的一個結果。而到了二十世紀70年代，由於世界性貧富差距的擴大，造成消費不足，再引致工業生產「過剩」，進入了另一階段的經濟長周期下浪，對低收入國家來說，工業化不單不是增長的靈丹妙藥，更可能掉進發達地區把生產過剩和環境污染的危機轉嫁給貧困地區的陷阱。

低、中收入地區在60、70年代的工業化浪潮，主要是西方發達國家因工資等成本上升，導致利潤率下降而將工業外移。這些「新興工業國」因此被迫要在一段時期內互相競爭用作工業投入的資源，使工業生產成本上升，同時又過量生產相類的產品，使它們在世界市場中的價格下調，造成了工業產品的利潤下降。與此同時，發達國家則把資金投放在金融資訊等第三產業，通過控制「新興工業國」千方百計要爭奪的資金，獲取厚利。

伴隨着低、中收入地區在60、70年代工業化的，也正是發達地區（特別美國和日本）的污染性工業的外移。據世界銀行兩位學者的一項研究指出，自1960年起，歐、美、日等地區的污染性工業佔工業的份額，持續減少。相反，拉美和亞洲等低、中收入國的污染性工業份額則穩定地上升⁴（Mani and Wheeler 1998: 231-233）。

因此，將「工業化」與經濟增長緊密聯繫起來，其實是一個重大的誤會，正如將富有國家稱為七大「工業國」，基本上忽視了一個重要事實，就是這些所謂「工業國」其實已愈來愈非工業化，愈來愈依賴金融貿易等第三產業。相反，低、中收入國家則愈來愈工業化。然而，正如薩靈士、華勒斯坦和阿銳基（G. Arrighi）⁵的文章分別指出，世界範圍內的收入不均程度，不僅沒有隨着第三世界地區的工業化而縮少，相反，在戰後至今的數十年間，甚至是在過去四百年內，更有擴大的趨勢。在97年，富裕國家約佔全球兩成的人口，共消費掉全球八成六的商品和勞務；而最貧困的兩成人口則只享受到全球百分之一點三的消费（聯合國《一九九八年人類發展研究報告》）

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如80、90年代的所謂亞洲「四小龍」），不論採用「自由經濟」的出口導向，或國家干預的進口替代式工業化；也不論是採取依附論所倡議的與世界經濟脫鉤或斯大林式的計劃經濟，以發展工業為目標的低收入地區的發展主義式的追求，大多數以失敗告終。事實上，工業化只是在某特定的歷史時段，對特定的羣體，如發達地區的工業資本家有利，而往往並不是低、中收入國家用來超英趕美的有效手段。只有那些在資本主義歷史周期中，置身於良好的地緣政治位置的地區，才會獲得資金的青睞，經濟才會較快速地增長。然而這些幸運地區的人口，只能佔全球人口的極少數，因為它們的富裕，是建立在對「稀有」資源的壟斷和對大多數人口的排拒剝削才得以實現。這是維持Roy Harrod所謂的寡頭財富（oligarchic wealth）的重要機制（見阿銳基文章）。換句話說，少數人的富裕是建築在大部分人的貧困之上，無論低、中收入地區的人民如何努力，也不可能每人都享有美式的「富裕」生活水平。事實上，正如華勒斯坦所言，在1750至1950年「發展了」的，只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而表面「發展了」的「國家」，其實只是獨享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擴張的經濟成果，而這種享佔，也不是個別國家的政策所導致的，而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剩餘積累「從中心溶化開來」的歷史效果。因此，「落後」地區的「趕上」，只能意味着別的地區的資本積累衰減，損害他人的經濟福利。華勒斯坦更預期資本主義世界的擴張已差不多到達極限，難以為繼。

發展主義者將「發展」過程中包括的種種複雜的文化、社羣以至偶然性因素，硬套為「技術和生產率」的提升、「創新效應和產業結構高級化」和「高強度投資」等問題，只是在強化一種十分偏狹的習見；而自由主義、計劃經濟和「以發展為主導的國家」學說之間的論爭，由於將經濟增長、工業化等視作理所當然，因此扮演着維護發展主義範式的共犯角色（見班魯銳文章），無法開拓新的論述空間。

「落後」的第三世界/邊陲的建構與規管

對於西方以外的所謂貧窮地區，發展主義論述給予不同的命名：「第三世界」、「落後國家」、「發展中地區」、「低度發展地區」、「邊陲地區」等等。儘管低度發展和邊陲等概念源自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等批判現代化理論的學說，但對於大部分應用者來說，它們大抵與「第三世界」或「落後國家」分別不大，都是同一的、等待發展的地區，而發展與否，基本上是以單一的目標——工業文明和政治軍事力量——來衡量。

艾思確巴（A. Escobar）的文章仔細地梳理西方發展主義論述如何建構「第三世界」或「低度發展地區」等概念，並分析這種論述是如何運作的。借助柯柯對知識、真理和權力的分析，艾思確巴追溯發展主義論述的歷史系譜，特別是發展經濟學等學科的专业化過程。

艾思確巴指出，發展主義論述自1945-55年在西方出現和形成，與殖民帝國解體和共產主義冒升有關，在這個歷史語境之下，西方為了界定自身的優越地位，建構出「第三世界」和「低度發展」等非西方地區的落後形象，提出要追上西方工業文明這單一目標，需要採納與西方發達國家相近的分類系統和技術，於是所謂窮國的人口、資本積累過程、天然資源、農業和貿易、行政管理以至文化價值，都成了無休止的規劃干預對象；發展成為一種專業，發展經濟學成為專業中的專業；引入外國技術、資金和投資成為發展的教條；而負責訓練發展專業的則是歐美的大學和國際機構，不僅培養「第一世界」的發展專家，更為來自「第三世界」的「學生」提供各種建基於經驗主義的社會科學「真理」。

發展主義論述透過標籤的生產，將紛雜多樣的農民化約為「小農」、「文盲農民」等生產因素，變成為可被替換和應該被管理、教育和規訓的對象。這種充滿現代化偏見的論述，在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協助之下，大規模地引入「第三世界」，強化了發展主義的意識形

態，和與之相關的生產和權力系統。

艾思確巴認為，對發展主義的最有力的批判，應該直接探討發展與知識權力的關係，並將對發展主義的批判，與在地（local）的各種抗爭連結起來。

儘管沒有像艾思確巴一樣借用福柯對知識權力的分析，但透過仔細分析發展經濟學家如何扭曲簡化邊陲地區開採業經濟的具體研究，和探討這種已簡化了的發展經濟模型如何進一步為政治家任意引用，奔格爾⁶（Stephen Bunker）的文章對艾思確巴的分析作出了緊密的呼應。

奔格爾指出，影響甚大的經濟學家赫爾斯曼（A.O. Hirschman）、諾斯（D. North）和沃特金（M. Watkins）所建構的發展經濟學模型，基本上是約化自加拿大學者伊尼斯（Harold Innis）對開採業經濟的詳盡歷史研究。伊尼斯筆下的開採業經濟，本是複雜多樣、跟工業經濟十分不同的經濟體系，在極大程度上受制於地質、水文及生物因素，因此開採業之間的差異遠大於工業經濟之間的差異，故不能將開採業經濟普遍化。然而，到了赫爾斯曼、諾斯和沃特金等人的手中，受獨特空間限制的開採業成為了千篇一律的經濟體系，當中紛雜多樣的被開採物被化約為一種生產因素的變項（所謂原材料），完全可被替代，空間和地形則被約化成為只是關於運輸費用的問題。開採業與工業經濟的唯一分別，就是能否帶動其他經濟部門的增長，或所謂不同程度的結連效應。

這種機械化的普同理論，不僅將部門與空間混淆，更以經濟學模型的貌似精確的措辭，建立一種科學的外觀，再加上當中對地區增長的樂觀許諾，吸引了不少政客和知識份子的接受。對這種發展模型持批判態度的反對者，被打成為頑固的反進步份子，或只顧地方特殊利益、妄顧國家大局的保守力量，因而很快被消音遺忘。

由於意義含糊和過於複雜，加上學科規訓踐行的「維護範式」（paradigm maintenance）機制——發展模型本身超然於爭辯以外，只容許對模型作出枝節性的批評——發展主義經濟模型成為了機會主義詮

xx 發展的迷思